

文明的质询 自然的挽歌

——试论刘醒龙小说中的道家文化意蕴

苏晓芳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湖北作家刘醒龙的小说中内蕴着鲜明的道家文化取向,而这种文化取向贯穿在他的乡村、乡镇与都市工业题材的小说之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对自然素朴的乡村文明的追慕、对异化人性的现代文明的厌弃、宽容因顺的道德观和女性崇拜。道家文化的浸染形成了刘醒龙小说创作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关键词:刘醒龙;道家文化;乡村文明;现代文明;女性崇拜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5)06-0780-06

在当代中国的作家中,虽然有不少人宣称自己主要是受到西方作家或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生存背景却始终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们,文化的断裂远不如想象的那样简单。而对于那些与乡土联系更为紧密的作家而言,外来影响更是退居次要位置,传统文化的精魂早已作为一种基因在其血脉中留存,并将继续延续下去。湖北作家刘醒龙有几个“新”的头衔:新写实、新乡土、现实主义冲击波等,但拨开这些新名词新术语的层层迷雾,寻觅刘醒龙小说的历史文化向度时,不难看出其内蕴的道家文化取向,而这种文化取向贯穿在他的乡村、乡镇与都市工业题材的作品之中。

一

刘醒龙以乡村、乡镇题材的创作见长,有评论者将他的这类作品称为“新乡土小说”^{[1](60)},从《威风凛凛》《凤凰琴》到《分享艰难》《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到最近的《痛失》和《弥天》,都与乡土有着密切的联系。

20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延续着两种传统:一是由鲁迅先生开创,并由王鲁彦、许钦文、蹇先艾、许杰等合力拓展的创作路向,即注重展现宗法制度统治下的农村在现代社会的日渐凋敝及有悖于人性的残酷陋习,大体可以纳入“国民性批判”的范畴,这类作

品大多遵循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一是由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田园抒情小说的传统,这类小说往往以浪漫奇丽的想象营造出世外桃源般的乡村生活情景,表达作家对现代都市的抗拒,对回归乡土的渴望,相对于前者的史的真实性,这类作品更具诗的审美性,这基本上是一条浪漫主义的道路。

刘醒龙的创作似乎更偏重于后者,但也兼具前者的某些特征。乡土在刘醒龙的笔下既是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场景,也是最能体现他的生命理想的载体,作家对乡村、乡镇寄予着浓厚得近于理想化的情感。一方面为乡土逐渐被现代都市文明的浸染而忧心忡忡,在这个层面上,他的创作表现出近乎残酷的现实主义的力量;另一方面又用全部心力试图在作品中重建他的带有道家文化特质的乡土生活理想,作品氤氲着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情调。于是,刘醒龙的乡土更大意义上是一种精神返乡,所以,他强调“乡土永远是人类最后的精神家园”^{[2](159)}。

道家文化认为,人的最理想的生存状态是“自然”“天放”,强调“道法自然”“人法自然”,当然这里的自然指的并非大自然,而是指任由万物之自生自灭,不去干扰它,压制它。人的本性就是与生俱来的无知无欲、素朴恬淡的自然之性,自然之性是本能的、内在的、天然的,这种赤子之心正是道家理想的人格。未经人力刻意雕琢的大自然当然是一种理想的自然形态,刘醒龙笔下的乡土带有更多原始、粗

收稿日期:2004-06-10

作者简介:苏晓芳(1971—),女,湖南桃江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南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放、朴拙的特征,人的理想生命状态总是离不开相应的自然环境的,最高的生命境界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如《爱到永远》中的屈祥与桃叶之于峡江与新滩,《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的陈东风与翠之于突击坡,《弥天》之中的温三和与秋儿之于安徽。

峡江上的船夫与新滩的滩姐代表着一种最原始也最朴拙的生命存在方式,船夫的粗犷雄健与滩姐的柔韧温情形成最典型的至阳与至阴的两极,他们从不顾及世俗的眼光,以一种极自然极素朴的方式生存着,自然形态的江与滩与人的生存相映成趣,实现了真正的“天人合一”。突击坡那长在山崖上的黄色燕子红,垵子里终日环绕在屋子周围的淡淡的烟雾,以及让人驻足忘返的松树、乌桕、香樟等等各不相同的气味,共同构成陈东风最心仪也最富诗意的生活方式,在这里人与动物甚至都是可以和睦相处的,翠与野兔之间是灵犀相通的,他们相互关怀、嬉戏,亲密无间。这使人自然而然地想起庄子寓言中的“至德之世”,庄子说:“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天地》)人不仅与禽兽同居,而且也如同禽兽一般,这里说的禽兽毫无贬义,道家主张齐物论,认为一切存在物的价值完全相等,不仅人与人之间无贵贱,人与禽兽也是平等的。而《弥天》之中则为我们构造了一个理想的桃花源,那就是与乔家寨仅一山之隔的安徽,温三和只有在这里才能避开政治的血雨腥风获得心灵的安宁。

在刘醒龙的小说中,最理想的人格代表是陈东风、屈祥和温三和,他们身上兼具自然、素朴、胸怀博大的道家文化特征。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不是知识者,陈东风只是一个县阀门厂的农民工,屈祥是峡江上的最骁勇雄健的船工,而中学毕业的温三和也只是在没有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利工地上相对于其他民工来说勉强算一个有文化的人。老子主张“弃智绝圣”,庄子则对之作重要发挥,将之变成实现“返朴归真”的具体方法,认为“圣智”是使社会朴真之德退化的总根源。庄子说:“举贤则民相轧,任智则民相盗”,“举贤”“任智”的结果,导致人欲横流,出现“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阡”(《杂篇·庚桑楚第二十三》)的丑恶现象。刘醒龙的小说表达了“绝圣弃智”的道家文化立场,他在作品中一再贬低知识与知识者,一切科技的、生活的进步

都是那么令人难以接受:电动剃刀代替传统的剃刀,煤气灶代替柴火灶,甚至烧栗木炭代替树莧取暖等等。他所纵情讴歌的劳动也仅指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和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都是备受责难的,表现出反启蒙立场,于是就有《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的退休大学教授隐居乡里,并谦逊地以农民陈老小为师;县阀门厂总工程师肖爱桥最初表现出知识分子不合时宜的清高,他试图以开发民智的方式对工人(陈东风与黄毛)进行科学启蒙,却遭到了被启蒙者的拒绝,而他与陈东风的关系最终竟发生了逆转,他屈服于陈东风的人格,成了陈东风的学生。陈东风虽然十分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却不愿阅读专业书籍,他宁可做一个一线生产工人,而不愿做勤于动脑而拙于动手的技术人员。

这种道家的反智倾向在《爱到永远》中也有所反映,“我”是一个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但在屈祥、桃叶,甚至同辈的肖姣这些峡江儿女面前就只有充当小学生的份了,所以,“我”的父亲龙克在大江截流之前不断催促儿子快去新滩看看,因为不仅那里的自然景观将要消失,桃叶也已病入膏肓。

理想的人生是顺其自然的,中篇小说《秋风醉了》中县文化馆的王副馆长当了三年的代馆长,为了将代字去掉,他处心积虑、苦心经营,但一连三次,结果都是出人意料地从上面调来一个新馆长,直到他终于死心了,干脆什么都不干,什么也不争了,“代”字却去掉了。这一颇具讽刺性的情节既反映了官场的无常与非理性,更蕴涵着道家无为、因顺的人生哲学。

道家虽不强调禁绝内心的欲念,但主张内心要恬淡少欲,认为这样不仅可以涵养人的精神,也可以保养人的肉体之身。在《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明梅因习惯性流产而未能生育,一直找不到医治的办法,方月的母亲教给她怀孕与保胎的方法非常简单,其一为节欲,其二为整天干活而“不像城里人将孕妇像菩萨那样供起来”,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人每天疲惫不堪,思想变得简单,这种恬淡少欲的状态正适合颐养身心。如果放纵内心的欲念则会给自己带来灾祸,刘醒龙在小说中提供了许多这样的例子:如汤有林贪恋女色最终掉下山崖,摔断了腰椎(《痛失》);林茂难以抑制自己心中日渐膨胀的贪欲的结果是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寂寞歌唱》);方豹子虽说是因为与大蛇搏斗而断掉一双手臂的,但作品却通过剃头匠的神秘预言暗示他也是因为贪欲而早就注定有此一劫(《生命是劳动与仁慈》)。

二

与对乡村文明强烈追求和怀恋的情感相反,作家对城市现代文明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感和厌恶。刘醒龙在创作自述《大路朝天》中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到城市,这么肮脏,这么喧嚣,漫天的尘土和漫天的秽语,像鞭子一样整天整夜地抽打着我,以至抽搐的灵魂和颤抖的心,几乎是哀求地问我,你为什么来这儿了,怎么不似那黑鸦鸦灰蒙蒙匆匆归去的蛇阵般的人呢?还在《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借主人公陈东风的内心独白批判城市文明的丑恶与残忍:

“城市太大、太残忍,一个人在他的面前是那样的微不足道。每天都有人被它放在汽车道上轧死,每天都有人被它抛入江水中淹死,每天都有人被它从大厦的窗户扔下去摔死,每天都有新娘或新郎被金钱与地位抢去,每天都有勤劳与善良被写成耻辱与卑贱。城市在做着这些可恶的事情时,开始不声张后来也不声张,白天板着灰蒙蒙的正经面孔,晚上让霓虹放出千种风骚,就像女人藏在化妆盒中的浪笑……”

因此,陈东风离开了已经有所作为的城市而回归故土。老一辈的陈老小们更是把对抽象的城市文明的憎恶具体到对于城里人的偏见上,陈老小在与陈二佰讨论“为什么乡下人畜排出的脏物可以做为肥料,而城里人排出的脏物不但不肥反而有毒”时说:“这是因为城里人的意识不好,养了那么多妓女流氓抢劫杀人犯懒汉二流子扒手小偷,还有贪污受贿投机倒把造假药假化肥假农药假种子写黄色书拍黄色电视等等许多的人,他们的一滴唾沫星就能毒化一段河。”陈二佰在告诫陈东风不要贪城里女孩的便宜时说:“城里女孩都是妖精,专吃乡下男人的精血,待吸光了就将他一脚踢开,不踢开的就让他当长工当奴隶。”在单纯善良的女孩翠的眼里,城里女人是没有羞耻之心的,她们“傍大款、吸毒、两尺布可以做一身衣服”。

城市是罪恶的渊藪,不仅城里人品行不好,淳朴单纯的乡村人进入城市,也极易沾染上城里人矫揉造作、取巧行诈、迎合世俗的恶习,而丧失本真天性,陈西风就是这样的例子。

正如乡土只是刘醒龙文化理想的载体一样,城市也只是他文化批判的一个对应物,在对城市的审

视与批判中,作家真正的忧思是整个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使人类已逐渐远离“自然”“天放”的健康生存状态,精神家园日渐荒芜,人类成为自己精心营造的钢筋水泥建筑中的囚徒、华丽都市中的流亡者。

老子认为,“大道废焉有仁义;智慧出焉有大伪;六亲不和焉有孝慈”(《老子》第十八章)。道家文化揭露了文明社会所出现的争夺、祸乱、虚伪、罪恶以及种种违反人性的异化现象,主张以“不违自然”作为人生的主体诉求,而这些是与其他诸家诸子的主张,特别是与儒、墨文化大不相同的。叶维廉指出:“在工业革命这个过程中,人的价值被减缩为货物交换价值”,“‘见树只见木材’,人的价值以其‘用’(木材)以其生产潜能(货物交换价值)为量度,结果是人性的异化,物质化,商品化,减缩化,也就是马库色(Marcuse)所说的‘单面人’(one-dimensional man)的凸显。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灵性’(人之为树,树之为树)和艺术中的‘崇高’逐渐由边缘化到稀薄到消失。这也就是奥提加所说的‘非人化’”^[3]。不仅人自身被“非人化”,在工业化过程中,受到蹂躏的还有与自然人性相互依存的自然。

《爱到永远》中,屈祥对葛洲坝的修建一直耿耿于怀,甚至不可思议地想去炸掉大坝,因为葛洲坝合龙之后,峡江水位被抬高,往日险峻的自然一夜之间化为高峡平湖,屈祥感慨男子汉从此绝迹了,吃奶的孩子和残疾者都可以撑船,而且这一钢筋混凝土的人造庞然大物为了“人”的利益而阻断了众多水中物种的徊游,并由此导致它们的绝灭。他希望回复以往的峡江,以重新塑造出真正的自然的人。当人不再与自然保持一种平等的关系,而以人为万物之灵长,把自然当做自己的奴仆肆意地使役、剥削和掠夺时,人类毁灭的是自己的家园,执着于自然的、本真的人的精魂也将消失在这个继续走向异化的世界。所以,峡江人依恋旧日的峡江,它气贯长虹,血气方刚,在峡江人眼里,葛洲坝的回龙、新滩的大滑坡和三峡工程的大江截流,都同样是峡江的劫难,它们使峡江面目全非,完全失却了本来的个性。峡江的消失,不仅是一种自然景观的消失,同时也关闭了一座巨大的文化宝库。柏木船、鱼坊、河铺和传统的民居没有了;挠工号子和“峡江活地图”将永远失传;没有礁石险滩,生命艺术失去袒露的机会;桃花鱼和中华鲟也许从此绝迹;而王昭君和屈原的历史正被那些无聊的“中产阶级”胡编乱造,染上了色情与铜臭。道家反对异化,认为“从人的天然本性上看,人与自然、人与外界就是和谐相融的,一旦返朴归真,就从

根本上消除了产生异化的根据”^[4]。

现代工业文明使社会历史和人类日趋进步,但其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对人的自然本真的扭曲与毒害也是不可估量的,这些反过来成为隐伏着的威胁人类生存的某种危机。

三

有人认为刘醒龙的作品中“流露出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并且这种道德主义倾向“弱化了现实主义的力量”,是作品的明显缺陷^{[1](62)}。笔者却以为刘醒龙小说中表现出的道德观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并与道家文化具有深层的联系。

不同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刘醒龙对于父辈充满崇敬,不敢有丝毫的冒犯,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所谓审父情结了。“父亲”们往往都是安贫乐道、隐忍节俭的仁者,“在家庭伦理方面,‘父亲’们孝敬老人,疼爱子女,与妻子相濡以沫,贫贱相守;在社会伦理方面,‘父亲’们既是劳动模范,又是人格高尚的楷模。”^{[1](22)}陈老小16岁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他一直是名闻遐迩的劳动模范,陈二佰因自己的劳动而在洪水到来之时拯救了县阀门厂许多人的生命;他们都视劳动为生命的本质,而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田细佰安守本分又嫉恶如仇,但为了大家的利益他宽容了强奸自己女儿的洪塔山、汤有林以及助纣为虐的孔太平,最后悲愤自尽,他想用自己生命的代价来警示和拯救孔太平(《痛失》)。铸造厂已退休的老厂长林奇不愿在家享福,每天踩三轮车,他十分关心铸造厂工人的生活,对贪污腐化的儿子非常不满(《寂寞歌唱》)。屈祥不仅是峡江最出色的船工,也是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真汉子(《爱到永远》)。王副馆长的父亲是个普通的农民,年纪大了住在县城的儿子家里,也不愿意吃闲饭,每天在街上摆鞋摊,为人修鞋(《秋风醉了》)。作家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饱含赞许之情,这些“父亲”的身上凝聚着作家的道德理想。

但是,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些“父亲”时,却发现作家对“父亲”们采取的基本上是扬善隐恶的态度与立场,对于“父亲”们的恶行或错误,总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非常轻易地包容了。陈老小一边与妻子梅夫妻恩爱,一边与方月的母亲另筑爱巢,而妻子正是找到了那小屋的钥匙,一时气血上涌栽倒在河里淹

死的,作家用了许多充满诗意的语言来描写陈老小与方月母亲之间美丽和纯洁的爱情,陈老小“用责任和良心爱着那个与梅有缘的女人,同时又用情感和生命爱着另外一个和桂一起飘香的女人”,但再美丽的语言也掩盖不了不道德的事实。陈二佰则是一个更残忍的人,他的妻子年轻貌美但好吃懒做,于是他与一个年青的寡妇生下了陈西风,在回家拿糯米给寡妇做些甜米酒补身子时,发现妻子一个人在家偷偷地煮糯米饭吃,于是他一怒之下又煮了两斤糯米饭,逼着妻子吃下去,结果肠子被胀断,活活痛死。而那寡妇得知消息后,留下孩子,一个人走进庙里作了尼姑。王副馆长的父亲也并非善良之辈,且不说他为了儿子的升迁如何处心积虑算计儿子的对手,即便是对于自己的亲孙女他也敢下毒手,他听说用烟油泡水喝能让好人变成哑巴的秘方后,每天就让孙女喝烟油水,目的是让孙女变成残疾人后,儿子可以为他生一个孙子。

这些在普通人看来非常不能容忍的恶行都受到了作家的宽容对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刘醒龙小说中表现的道德观除了张扬仁慈、隐忍等善行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恶的包容。“周介人先生曾就《分享艰难》提出一个关于‘大善’的观点,他认为大善能包容恶改造恶。果真这样,无疑那是社会最佳进步”^[5]。对此,刘醒龙具有充分的自觉,他说:“人与人之间不要成为对头,这是我在写作时最原生的心态。相信善能包容恶,并改造恶,这才是终极的大善境界。”^[6]道家主张常善救人无弃人,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第四十九章)圣人以诚心善心去对待一切人,无论别人是善人还是恶人,无论别人是守信之人还是背信弃义之人,圣人都能够以包融无限的胸怀去看待他,善与不善,信与不信在圣人心目中的区别变得模糊、混沌,他们被充分地理解着。

即便是对于比“父亲”们更多恶行的人物,刘醒龙也是以这种宽容的态度来对待的。《痛失》中的孔太平是个卑鄙的政客,他巧言令色、吹牛拍马、放纵情欲,对于权势与美色的贪欲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这是一个完全沉沦了的丑恶灵魂。作家对孔太平的态度一如他对他作品中常表现的其他农村基层干部一样都是同情的。《弥天》中的乔俊一是乔家寨大队党支部书记,他是个土皇帝式的角色,成天背着一支自动步枪四处游荡,遇到不顺眼不顺心的人或事就端着枪朝天朝地朝人家的房子扫射以此示威,声称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了向上级邀功请赏,他欺上瞒下成倍地扩大水库工程的建设规模,白白耗费国家的财力和物力,浪费数万民工的劳动力,天寒地冻也不允许民工回家过年,引起民工的反抗,他草菅人命,酿成水利工地上的血腥惨祸。即使是这样的人物,作家也未对他进行道德批判,反而将他塑造成一个不失人情味的人物,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温三和病重时,他的母亲按照乡村的习惯去“叫黑”。作为封建迷信活动,“叫黑”在当时是被严令禁止的,然而乔家寨的领导人乔俊一却偷偷地和温三和的母亲达成默契,并为她提供纸钱,去完成这样一种乡村的“仪式”。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是本于伦理的,而道家则强调本于自然。刘醒龙尽量避免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道德评价,这不仅体现出道德观念上的宽容与开放,也吻合了道家文化顺其自然的特征。

四

杨剑龙在评论《弥天》时指出作品中的“宝玉情结”^[7],17岁的温三和与小说中的三位年轻美丽女性都有亲密的交往:区委广播站女播音员宛玉、高中时的女同学金子荷、安徽女子秋儿。其实,早在《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作家就显现出这种情结,主人公陈东风也为众多城乡女性所环绕,爱情线索上也是杨剑龙所说的“一男多女的情爱故事”,乡下女子翠、城里姑娘黄毛、墨水、王元子、已婚少妇方月都对他情有独钟;《痛失》中的孔太平也与除了妻子月纺之外的多位女性有染:“青干班”同学安如娜、镇妇联主任李妙玉、娥媚等。除了官场中的女性(这种女性是谈不上美的,因为她们已沾染了太多世俗的恶习,失去了赤子之心),大多数女性在刘醒龙笔下都是善良美丽的,即便是墨水、黄毛这样在相貌上有明显缺陷的女孩,作家都尽量展现她们经过适当修饰之后独特的美。更重要的是,作家着力描写了这些女性美貌之外的柔韧坚强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内在力量。

与贬抑女性的儒家传统不同,在道家文化中,女性是拥有尊崇地位的,道家学说被指称为女性哲学,因为它大量吸收女性智慧,对女性的处世经验加以概括和发挥,将其作为基本命题融入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在阴阳和谐理论的阐发中注重阴柔,大力赞美张扬虚静柔韧的女性特质,尊崇母性为世间万物产生的根本,所谓“贵柔守雌”。《老子》中常用女性生

殖器或母体形容道,如“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第六章)谷神,一说为“道”,一说为女性生殖之神。“牝”指的是一切动物的母性生殖器官,“玄牝”则是巨大深远的而不可见、却又神秘而可以生产万物的生殖器的象征。玄牝之所以值得推崇,就在于她犹如母生子般地生养着万事万物,为天地之根。老子还直接用“母”与“子”来比喻道与万物的关系:“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一章)

相对于男性的刚强来说,女性的特征就是柔弱,而道家所崇尚的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就是以柔弱顺自然为主要特征的,在这里,“柔弱”并非“软弱”,而是“柔韧”,是以深厚的生命底蕴坚毅不拔地应对外力的作用,富有弹性,具有极强适应环境的能力。这种“柔弱”之道正是天下事物生生不息之源,也正是“道”所表现的柔弱,使万物并不感到是被强力所造的,而是自生自长的。对于女性而言,也恰恰是其柔弱如水的特质,成为世界生殖力量“阴”的象征,《老子》中“负阴而抱阳”“牝常以静胜牡”“知其雄,守其雌”等贵柔崇阴的话语比比皆是。所以说道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女性勤劳质朴、坚韧吃苦、慈祥 and 亲、温柔多情等美德哲理化,将女性所特有的一般属性升华为一般性的思想原则。

刘醒龙的女性观也打上了鲜明的道家文化的烙印,通过对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不难看出作家的女性崇拜倾向,这种倾向集中体现在一系列近乎完美的“圣女”或“圣母”形象上,如翠(《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秋儿(《弥天》)和桃叶(《爱到永远》)。三者虽然命运各异,但都兰心慧质、柔顺多情,具有一种伟大的母性。翠是个美得像燕子红一样的山野女子,她不贪慕虚荣,不愿遵从父母之命嫁给一个四十多岁的城里干部,离家出走,借住在她所心仪的陈东风家里;她为人仗义,帮助被丈夫遗弃的水珠母女;她每天耕地种菜、采桑养蚕,固守着一个劳动女性的本分;在爱情上,她勇敢而不失含蓄,羞涩而不忸怩做作,所以,尽管陈东风受到了许多女性的情感诱惑,但最终自然地回到了翠的身边。安徽少女秋儿也非常漂亮,她对男主人公一往情深,跟另外两个同样钟情于温三和的美丽女子宛玉和金子荷相比,她显得更真实、真情和真诚,正如小说中不学大寨、不修水利、生活相对富裕的安徽是文革政治背景下的世外桃源一样,秋儿的淳朴自然的怀抱就成了温三和躲避政治权利斗争的血雨腥风的温馨港湾。桃叶则是一个传奇性的女子,她肌肤如玉,散发着桃叶橙

般醉人的芳香,只有这样的女子才能培植出“桃叶橙”这样珍稀的佳果,也只有她才能烹制出让人喝过就终生难忘的可口的鱼汤,她令几个男人一生为她魂牵梦绕而不敢对她有所冒犯,这是一个理想化的完美圣洁的“圣母”形象,是真、善、美的象征。所以,作者说:“男人无论平缓和湍急,总是像水一样来去两匆匆,只有女人才是两岸一扇扇挺立的绝壁”,这样的女性既是男性的塑造者,又是他们的守护者。

我们在考察作家的文化渊源时,往往首先考虑的是这样两个维度,一是历史文化,一是地域文化,具体到刘醒龙的小说创作,这二者又是统一的。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刘醒龙是湖北作家,楚文化浪漫神秘的精魂早已渗透作家的血脉,平实而冷静的叙事难掩其内在的浪漫诗情;而道家文化从老庄时代起就有着楚文化的基因,道家文化的浸染形成刘醒龙小说创作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8]。当我们以此来读刘醒龙的小说时,

也获得了更多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程世洲. 血脉在乡村一侧——刘醒龙论[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 [2] 刘醒龙. 〈白菜萝卜〉自序[A]. 血脉在乡村一侧——刘醒龙论[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 [3] 叶维廉. 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4] 那薇. 道家的直觉与现代精神[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5] 刘醒龙. 浪漫是希望的一种——答丁帆[J]. 小说评论,1997,(3):77-78.
- [6] 俞汝捷. 刘醒龙. 由《大树还小》引发的对话[J]. 江汉论坛,1998,(12):117-118.
- [7] 杨剑龙. 回溯荒唐年代的弥天大谎[A]. 弥天[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 [8] 鲁迅. 鲁迅全集(第1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Civilization's inquiry and nature's elegy ——on the Taoist Cultural meaning of Liu Xing-long's fictions

SU Xiaofang

(Literature collag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Liu Xing-long, writer of Hubei province, his fictions have distinct Taoist cultural meanings, which involves four aspects: enjoying the simple local civilization, detesting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which dissimilates human nature, manifesting lenient ethical concept and adoring feminine. The Taoist culture is the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Liu Xing-long's fictions'.

Key words: Li Xing-long; Taoist culture; local civilization; modern civilization; worship of feminine

[编辑:苏慧]